

# On Knowing essays for the left hand JEROME BRUNER



[美]杰罗姆·布鲁纳著  
彭正梅译

论左手性思维——直觉能力、情感和自发性

·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

---

# 论左手性思维

——直觉能力、情感和自发性

[美]杰罗姆·布鲁纳著 彭正梅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左手性思维:直觉能力、情感和自发性/(美)布鲁纳  
(Bruner, J.)著;彭正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书名原文:On Knowing

ISBN 7-208-05096-1

I. 论... II. ①布...②彭... III. ①认知-研究  
②思维生理学-研究 IV. B8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581 号

责任编辑 湛 嘉

封面装帧 杨德鸿

·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

论左手性思维

——直觉能力、情感和自发性

[美]杰罗姆·布鲁纳 著

彭正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34,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5096-1/B·421

定价 15.00 元

献给我的妻子布兰奇

## 中译本序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的书被翻译成汉语并在中国出版。对于中国文化，我有着深深的和持久的敬意，也总是乐于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

这本著作在40年前首次出版。它是对当时自绝于人的文化主流的心理学的—种回应或—种反对。为了解决这种隔离问题，我在40年前开出了基于直觉和艺术作品理解的“左手性的”认知这剂方药。这与严格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的“右手性的”心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鉴于当时的心理学界的氛围，我现在仍能理解为什么当时我也采取了这样一种隔离主义的立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完全放弃了这种观点。我认为，若与人类在其中成长和发展的文化相隔离，我们是不可能理解人的本性的。因此，我现在极力拥护和倡导“文化心理学”，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多年。我相信，人的精神生活的特性是由意义形成的（meaning-making）。正是朝着这样的意义形成，我们的精神活动才得以定向。对于这个观点，我曾经在我后来的几本著作中提出证据并进行了论证。这在《意义的活动》（哈佛大学出

版社,1991年)中表现尤为明显。不过,这种观点也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关人的发展的诸多著作中的中心。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对范式的或逻辑的思维和叙事思维之间的区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的许多思维是借助于叙事和讲故事。叙事思维是我们对发生了什么、什么又将要发生等常识思考的普通方式。当然,它也是文化藉以传递其方法和智慧的基本方式之一。40年前,我认为范式的思维和叙事思维之间的区别,与右手性的认知与左手性的认知间的区别类似。不过,现在看来,这种类比是不够恰当的,因为叙事思维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和直觉。它表现于精神生活的日常活动之中,例如,当我们与他人分享我们思维的意义时,当我们与更广阔的文化进行联系时,我们都是运用这种叙事思维。

对于叙事思维我写了若干著作,它们对于本书的阅读及其后发展的理解也是很有帮助的。这些书主要是探讨叙事思维和叙事文化,均是最近出版。其中一本名为《教育的文化》(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主要探讨怎样把这些观点运用于教育。另一本是《关注法律》(也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与安东尼·阿姆斯特丹合著),主要探讨叙事与法律。还有一本是《论叙事:法律、文学和生活》(纽约: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2002年),它主要是我在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的讲座报告集。

最后,我只能重复: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够在中国问世。它是我多年前的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当然,这得感谢彭正梅博士和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杰罗姆·布鲁纳于2004年1月6日

## 译者的话

—

杰罗姆·S. 布鲁纳 (Jerome S. Bruner, 1915—) 的名字, 对于我国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并不陌生, 我们知道他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认知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教育学上结构课程论的开创者和倡导者。特别是由于我们这次国家课改, 他的名字及其课程观甚至越出了学术界, 为国内广大教师、校长和政府官员所熟知。然而,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 我们显然缺乏更多的深入了解。

布鲁纳 1915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中上阶层家庭。1937 年毕业于杜克大学, 后转入哈佛大学, 并于 1941 年获得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曾在艾森豪威尔统帅部工作。战后, 布鲁纳返回哈佛大学任心理学讲师。1947 年, 他发表了《论需要在影响知觉中的重要性》。他在文中指出, 贫穷儿童较之富裕儿童, 往往更倾向于高估硬币的大小,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 价值和需要有力地影响着人的知觉。他的这种知觉论为传统上一直重视行为主义心理学

的美国的认知心理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52年,布鲁纳晋升为教授。1960年,他帮助建立了哈佛大学的认知研究中心,并推动了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1960年,布鲁纳发表了对当时的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教育过程》。当时有人评论说,“对渴望用明白易懂的文笔来合理评论教育的人来说,布鲁纳的著作是无可指责的”。这本著作直到现在还是中国教育学者和研究者的必读书,并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产生着持久的影响。他的研究工作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和认可,1963年,美国心理学会授予他杰出科学奖。1965年,布鲁纳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1972年,布鲁纳离开了哈佛,去英国就任牛津大学心理学的瓦特教席。之后,他又辗转于世界各地讲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布鲁纳的兴趣有所侧重或转移,开始关注叙事思维在人的精神活动等诸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也体现了一个学人不老的学术追求。现年已89岁的布鲁纳,现在仍奔走在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学术“路上”。

## 二

布鲁纳在中国心理学界,特别是教育学界的命运,有点类似科学教育学创始人——德国的赫尔巴特。心理学界知道些他的心理学思想;教育学界知道些他的教育学,特别是课程的思想。在中国,正如有两个赫尔巴特一样,实际上也



存在着两个布鲁纳，而且这两个布鲁纳还互相很少联系。大家都知道，在教育学上，杜威反对赫尔巴特，而布鲁纳又反对杜威。我们对杜威的认识和研究比较多，而对赫尔巴特和布鲁纳认识和研究得很少。因而，对于这三个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正、反、合”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不足和误解，并进而也影响了对我国教育实践的理解和革新。因而，此次上海人民出版社选译和出版布鲁纳的这部著作，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布鲁纳，即有教育关怀的心理学家和言之有据（心理学的依据）的教育学家（教育心理学家）的布鲁纳，而且对于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更深地认识和把握他的思想，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我国时下的一些“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并以一管之见自美且傲人的、沉醉于或沉溺于所谓的纯粹学术的心理学家和盲目蛮干的所谓的教育学家之于布鲁纳，不仅有点像《庄子·秋水篇》中的河伯将“长见笑于大方之家矣”，表现了其“单手性的”狂妄无知，而且就其德行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毕竟，心理学的对象是人，没有人（人文）的心理学是枯燥的胡说和阴森的演绎；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褊狭，必将导致教育实践和人的褊狭。

那么，这本被称为布鲁纳的“最具个人智慧”的著作到底说了些什么？这里，我想引用摘自《纽约时报书评》的一段文字来对此进行说明。

左手在传统上代表直觉能力、情感和自发性。在这部经典著作里，布鲁纳探索了人的这些品质在以下几个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确实知道什么”；“我们如

何帮助他人认知”，也就是教学问题；“我们对现实的理念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并受行为所修正的”。

本书对人类认知本身的核心问题都进行了大胆而细致的论述：创造性，身份的寻求，审美认识的性质，神话，学习过程，现代人对社会控制的态度，弗洛伊德，命运。这个增订版本显示了布鲁纳努力坚持在直觉和理性平衡的基础上来理解人类本性，并探讨了过去学术性心理学阻碍对人类进行合理认识的奇特的历史环境。

本书富有智慧、想象力和对人类境遇的深深同情。布鲁纳指出，单靠右手性的秩序、理性和纪律，人类的精神永远不会走向完善。

“本书之所以令人激动，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方法，还因为它选择讨论的主题……令人振奋，而且还因为它是一个活跃的大脑的产物，它把自由也赋予给了狡黠的左手，而不仅仅是右手。”

布鲁纳是个阅读广博和见解深邃的学者，“他也许是杜威以来第一个能够对学者们和教育家们谈论智育的人”。因而对于布鲁纳这本书的完全把握和恰当翻译是有一定难度的，本人才疏学浅，虽已尽力，亦恐错误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另外，我还设法和布鲁纳先生联系上，请他为中文版写了一个序言。当然，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本书和布鲁纳本人的学术动向。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胡庆洪先生翻译，后来他身体不适，便经社里的湛嘉女士转到我的手

---

里。这虽是偶然,但我还是把它视为一种缘分。因为我始终认为,阅读布鲁纳是令人振奋的。至于我的翻译是否传递出了这种振奋,对于读者和我本人而言,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耳。

**彭正梅**

## 序

对于那些一起用餐的朋友和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对于那些充满焦躁却因这焦躁而有助于滋养一种怀疑意识的大学生以及阻止混乱出现的精神管理者们，对于那些使我有可能会拥有自由时间的基金会，我承认我欠他们很多，需要偿还。一所著名的大学的存在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乔赛亚·罗伊斯在评论哈佛社区时曾经指出，对于大学来说，讨论是最自然的存在方式。

有好几位亲密的朋友给了我特别慷慨的建议和鼓励。乔治·米勒、艾伯特·古尔拉德和埃尔廷·莫里森，是我聆听教益的源泉和培养耐心的楷模。从伊丽莎白·威姆斯·所罗门那儿，我总是可以获得明确的建议。在整理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过程中，马克·萨克斯顿始终和我一起无私地工作。鲁思和理查德·托尔曼很早就鼓励我继续本书所述的探索。对于他们的去世所带来的损失，我们中的很多人现在还能感觉到。我的妻子，布兰奇·马歇尔·布鲁纳，是我写作本书时忠实而又极富启迪的伴侣。

许多博物馆和摄影师为本书提供了资料。下列出版社

和期刊慷慨允准我复制它们的资料：费伯有限公司、乔治·布拉奇勒公司、《哈佛教育评论》、《国际心理学杂志》、麦克米伦公司、《数学教师》、《党派评论》、《心理学评论》、《记者》、鲁珀特·哈特—戴维斯有限公司以及《星期六评论·教育副刊》。

**J. S. 布鲁纳**

**1962年1月**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 增补版序

小论文的文体是颇为独特的。它一般包含一个论题和一系列限制,这些限制规定了我们可能的叙述方式。若是不顾这些限制,小论文就会显得结构松散、不够严肃和没有章法。在字面上,小论文对应于逻辑学家的“可能世界”,或有点类似科学家的“思维实验”。本书的每一篇都从一系列相关的熟悉材料开始,并试图通过将它们重新组合,以跃到一个新奇的、更高的层面。显然,这种新奇处是植根于原先所熟知的材料的。

本书最早是以独立的小论文形式写出的,每一篇都围绕一些熟悉材料而展开:弗洛伊德对人的常识的影响、命运的观念、现代小说的性质、惊异在思维中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我所感兴趣的内容。但是,并不是因为我感兴趣才去探讨这些问题的,而是因为其他人也对它们感兴趣。我讨论的焦点是一般的智力兴趣的本质,而不是去着力探讨比如说,为什么这些特殊的问题占据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高校知识界。因此,不论是在小论文里,还是在一个逻辑化联结的可能世界中,或是在科学实验中,是什

么促使人们去超越某些具体的问题而寻求一般性，对此我都十分痴迷。

首先，请允许我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即内在的智力活动几乎永远是对话的持续。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俄国心理语言学家维果茨基就是这方面最著名的阐述者。他认为，儿童的思维发展取决于对对话的参与，因此，假以时日和多加实践，对话就会内在化了，便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智力活动。虽然这种思维是由内心的谈话形成，不过，也有大量证据提醒我们远离这种看法。实际上，即便外在的对话也是建立在对于世界的共享的、非语言的预测之上。另一方面，这些预测也是由意识的结构形成的。这种意识结构使我们比较容易以这一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来体验“现实”。更确切地说，正是辩证的、近于戏剧化的对话，为我们在自己的私人意识里寻求发展自己的思维提供了一种模式。

本书的每一篇小论文都是由谈话引发的。例如，关于弗洛伊德的小论文就产生于与格雷特·比布林、罗伯特·奥本海默和埃尔廷·莫里森的谈话。这篇小论文关注的是，思维体系——不管能否经得起常用检测方法的验证——是以什么方式改变、改善乃至形成一代人的思维模式的。我的对话伙伴包括一位分析心理学家、一位物理学家（他们相当欣赏弗洛伊德，尽管对他的观点仍存些许疑惑），还有一位是历史学家（他的毕生兴趣是研究社会中权力和观念的关系）。他们个个都是意志坚定的著名专家。因此，在每一次谈话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争论。由于对话特有的活力，你往往在两个方面感到约束：开始，你宁愿认为别人的

立场是理所当然的，过了一会儿却又出现了反对别人的假设的不友好行为。这情形就像病态故事中的终生囚犯一样，他们对别人的每一个笑话都烂熟于胸，一提囚犯的编号就能将其笑话倒背如流。无论是对他们的论证作出反应，还是记下达成的共识，你都会感觉受到了限制。原先的话题在大家的心目中变得无聊起来。在默默的相互认可下，大家不再提及这个话题，或充其量不过是像终生囚犯的编号一样被提起而已。

无聊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感受，是一种在大剂量下对智力有害的毒药。像许多其他毒药一样，小剂量的无聊则是一种相当好的兴奋剂。我认为厌倦始终以某种深沉的方式渗入智力活动。因为通过研究熟悉的材料并以某种方式加以重新组合从而使得熟悉的材料产生新意，这是所有的科学和绝大多数的人文学科推进和发展的方式，因此，无可避免的是，我们间或会落入谙熟的圈套，并遭遇到无聊。与他人的对话可以使我们摆脱带有强制性的、熟悉的“主题”（subject）的束缚。但是，很遗憾，对话最终也可能会走到那条终生囚犯的故事的老路上去。

然而，正是在这点上，小论文是一种合适的文体。小论文的方式可以撇开对话时来自他人的约束，可以提出任何假设也不会有伤他人感情，还可运用逻辑学家或科学家所禁用的隐喻方法进行探讨。何况，小论文的文体相当精致简练，不必为论点而进行繁琐论证。戴维·奥尔森坚持认为（我也认为很有道理），力图超越对话的限制，超越情境化的、真理的定义，正是小论文形式的特征，甚至是其历史根



源。正如路德所说，“意义存在于文本中”。

我曾说过，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产生于我对某些感兴趣的素材的接触。显然，这些素材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朋友们说，这是一本非常个人化的书。这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我没有仅仅运用普遍的实验方法或逻辑分析来探讨这些论题。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标题：“关于左手性思维的小论文”。自从这些小论文发表以来，左手，我的左手，便经历了艰难的时期。也许这样说更合适些：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左手主要是忙于我们曾经历的政治问题。

那时有越战、大学生的暴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反对种族和民族歧视的斗争。对此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大学生抗议活动的疯狂和哈佛大学臭名昭著的“警察打人”事件，都促使我更深入地频繁卷入到大学的日常生活中去。我开始关注学校改革，关注非洲，关注教育起步平等计划(Head Start)。莫非这是更适合行动而非思考的时代？

我记得，我曾作为哈佛大学校长任命的委员会主席，主持清理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事务。在我办公桌对面就是现役的海军和陆军的军官代表，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极为尊敬他们。同时，我还记得，当时，有些大学生和导师住在我哈佛的家里。我欣赏他们“尝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勇气和信念。尽管我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仍对他们的正直充满了敬意。也许，我是典型的充满矛盾的自由主义者，常为赞赏对手的优点而备受折磨。

那是一个适合短文而不适合小论文的时代，尤其不适